

一次难得的自我发现与提升

□李敬泽

这次展评会开得非常有创意。设计独特，安排周到，形式新颖，这很重要。首先说明我们研讨会的会风、会的形式需要改革和变革，其次说明大连的观念和意识确实是有所不同的。展评会在文学界是很少见的，这里所包含的观念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。中国的当代文学丰富多彩，在谈到当代文学的时候，一般读者，甚至是我们的专业研究者们印象中可能就是那些知名作家。经常浮在我们意识表面的作家固然都很重要，但是当代文学的复杂性、丰富性，包括很多没有浮在表面的作家的独特价值，却没有被充分的认识和挖掘。如今我们研究现代文学，很大的一个学问路数，就是研究现代文学中那些在主流叙述中没有被充分认识的作家，过了七八十年重新翻出来说很好，我们不应该把当代文学也搞成现代文学那样，要早一点发现谁有谁很好。当代文学应该不断随着文学的发展增强自觉性，有一种不断自我发现的精神和热情。

这次会议也是一次自我的发现。我们认识这几个大连作家，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当代文学自我的发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让我们认识到大连有这样一批“60后”的作家。这个事实很重要，我们研讨的这7位作家都有相当丰富的创作经验，也有相当大的创作成就，同时都已年过半百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创作上的得失以及今后的创作方向和着力点，可能对于他们本人来说是特别重要的。

记得7年前我在参加津子围作品研讨会时说过，津子围小说的特点是长期在高原上，但是始终没有攀登上珠穆朗玛峰。这里可能有令人遗憾的一些问题需要探讨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，我们有一个词叫中年写作，在评论术语中常常被当成一个负面的词，中年写作可以与中年危机等同起来。但是这恐怕是一个误区，“60后”中真正了不起的人现在可能刚开始写，或者还没有开始写。文学和弹钢琴不一样，到我们这个年龄去弹钢琴肯定没有希望，但文学不同，因为中年本身就是一种力量，对入类经验有深入的把握，对世界有独到的、世事洞明的看法，对自己是什么、要什么有明确的坚决的认识。中年可能是危机，但同时更可能是力量。

这次会议是“60后”评论家和“60后”作家的一次相互共勉，谈一谈什么叫做中年的危机和中年的力量，谈一谈这种中年的力量中所包含的中年的创作的可能性。所以，会议不仅对大连的7位作家有意义，对于我们认识中国当代文学的丰富性，对于我们认识创作的一些基本现象和基本规律，都是有意义的。

陈晓明：

津子围的叙述从细中出走

对津子围的作品，我一直想找到一个角度，后来找了几个角度都有难度，后来缩小为一小部分，就是他的一组写警察的作品。其实，警察是很难写的，警察在我们中国的当代文学中是被固定化的、被本质化的。在某些作品中，警察充当两种功能，一方面他们是作为抽象的符号化的代表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经常形成系列的讴歌警察的作品；另一方面在反压抑的叙述中，经常承担了功能化的符号。如果没有警察形象带来的正义，我们社会的秩序就无法健康。不管对他们的叙述多么理想化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，因为人类是一个共同体，要维持这个共同体。但另一方面又有对他们的反思性，把他看成是一个反压抑符号的代表国家及其压迫性的力量，如果没有这样的反思性，把法看成一种无限的正义、把法看成一种正义的等号的话，那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。

津子围写作的独特性，就是在法和日常生活的中间地带，写警察和罪犯的故事。他塑造了罗旭刚这样一个警察，他是正直、善良的，是人民的好警察，但又有许许多多的缺点，有许多普通人所具有的七情六欲。把警察的多样性、复杂性还原于日常生活中。罗旭刚这个形象是当代警察的缩影，是津子围的一个贡献。

津子围小说的另一个独特性，就是把一种悲剧性的东西荒诞化。津子围的小说起因总是荒诞的，《讹传》《谁最厉害》《求你揍我一顿》，起因都是非常的奇怪，他在还原警察的日常生行为上，写出了生活在交叉地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。

他叙事的独特性还表现在对细部的把握。他的小说不是从细中进入，而是从细中出走，寻找一个戏剧性，最终要解脱。这是津子围小说始终保持的一种风格，这个风格我称之为灰色幽默，他的灰色幽默到了一定程度不往黑处走，到灰色就停止了。从细中出走之后很多矛盾就化解了。总之，戏剧风格与灰色幽默构成了津子围小说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。

阎昆明：

创作于传统与现代之间

津子围是大连非常出色的作家。他的小说是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过渡的一种创作产物。我看了他的小说有一个感觉，他是一个专门为一座城市写作的作家，写生活在这样一个城市的人，写人和人的关系，写陌生人之间的紧张关系。两个人本来不认识，某种契机使他们结识，结识之后产生很多矛盾，这些矛盾既有复杂的纠缠，也有感情上的纠葛。

津子围的小说喜欢用公共汽车作为两个陌生人认识的场所，比如《一顿温柔》，在一辆公共汽车上两人相遇，相遇的场景以及相识的过程就是因为公共汽车上非常挤，女的怀疑男的对她非礼，吵了半天才发现是中学同学，于是两个人开始交谈，之后在一个车站下车，一起走路，去吃饭喝酒，后面发生了暧昧的故事。比如《昨日之雨》，一个教授在等公共汽车时碰到一个女人，说了几句话，却被警察莫名其妙地抓到派出所，原来是因为那个女人丢了500块钱，警察怀疑是他偷的，正好他身上也有500块钱，结果产生了一系列的故事。《合同儿子》中也是汽车，小伙子酒后开车，半夜撞死一个人，逃匿被抓之后，发生了他和死者父母的交往，和死者的父母达成一个合同儿子的关系。这使我想到一个问题，很多传统的小说，很多小说家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，就是在一部小说

近年来，津子围、侯德云、陈昌平、张鲁镭、刘东、于立极、紫金7位大连作家创作活跃，他们的题材体裁各异，门类丰富多彩，体现了大连文学开放性、多元性的品格，其作品描绘出的地域风情、艺术特色和独异的“海蛎子”语言，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大连文学地图，这个被称之为“海蛎子组合”的“60后”创作群体值得关注。

“海蛎子组合”是一个精彩的命名。海蛎子是大连人最喜欢的海产之一，大连人说话都带着浓浓的海蛎子味。

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，达理就写过小说《卖海蛎子的女人》。因此，以“海蛎子组合”描述7位作家最贴切不过。大连“60后”作家群不是一个追求同质化的作家群，而是每一个作家都有鲜明的个性，因此我愿意把“海蛎子组合”比喻为一个音乐组合，几位作家便是这个音乐组合中不同的乐声。

津子围是非常善于讲故事的，最初写小说走的是通俗小说的路子，如果这样走下去的话，或者成为一个很成功的畅销书作家。但是，津子围的内心始终有一种追求精神之迷的渴望。他的小说叙述空间很大，无论是写都市白领还是普通市民，关注的都是现代的精神性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他把小说当成呵护自己灵魂的地方。在《童年书》中，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处理童年记忆，我发现津子围在这部小说里的自由飞翔更加优美。另外，我还要强调，津子围的叙述也具有先锋的特征，他的小说并没跟着每一次文学潮流的兴起而红火，但也不会因为潮流的推却而沉寂，他的小说经得起岁月的考验。因此我说津子围是一个电子琴，音乐是时尚的，音域是宽广的，表现力也是极其丰富的。

陈昌平的小说有一种厚重感，就像单簧管在高低音区徘徊时让人领略到一种浑厚而丰满、深沉而抒情的魅力。他的中篇小说《英雄》写一位普通的退休工人，当他激活了内心埋藏的英雄情结后，生活就变得壮丽辉煌起来。陈昌平让英雄精神以平民化的姿态回归到文学中来，有一种匡正时弊的作用。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陈昌平的眼界是博大的，从他的小说里，比如《国家机密》《特务》《汉奸》等等，都能够读出政治情怀和社稷意识，因此他也更偏爱历史，他把自我看成是一个历史的产物，把自我融入历史叙述之中。而他书写现实的作品则拖着绵长的历史的影子。再比如中篇小说《肾源》，写一个房

里设法让陌生人认识，认识之后产生戏剧性的故事，通过故事激发出小说的意味和沧桑的感觉。津子围的小说还有一个特点，故事的最后总有一个爆发点，有一个戏剧化的结尾。他的小说让人想起了莫泊桑的创作。公共汽车的意象，结尾的处理都是这样的方式，这是一种经典的、传统的西方短篇小說的处理方式。

津子围并不是看完别人的小说后，按照人家的路子重新写，他的小说还有一定的发散性，是当代性的创作，所生发出来的意味更加复杂，矛盾冲突因为误会产生，最后通过化解、理解达成一种和谐。作品中往往先描写一种尴尬，到最后总要体现出一种淡淡的温暖，这是我对他的小说产生好感的很重要原因。

总之，津子围的小说非常讲究，是传统小说和现代小说之间过渡性的产物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只看他的五六篇小说还不够，至少还要看一些，如果这个规律是可以成立的，我觉得津子围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解剖的作家，而且也是当代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中很有特点的一个小说家，值得很多小说家借鉴。

孙 郁：

乡土记录与民间寓言

侯德云的微型小说集《圆的正方形》，写的都是辽南的故事，乡音乡情浓烈地散落着。这本书我是一气读下去的。辽南的民间传说，苍生里的冷热，都活生生地印在文字里。如乡土的记录，也似民间寓言，泥土气与笑意味都混杂于其间，有别的书里没有的韵味。

当代小说林林总总，有一类专写民间的炎凉之态，被称为“世相小说”。这类作品乃现象的再现，笔法在写实的世界里。侯德云的微型小说，写的就是辽南的世相。我看他的书，对故乡的风貌有了一种新的感觉。作者有时候用的就是土话，乡间的味道、民风的妙意暗藏其间，有很朴实的语意。另一方面，写了诸多人的命运，从世风里看道德与爱欲，人性的诡秘与可笑悉入笔端。辽南人的思维空间是封闭的，精神生活没有多少神秘的东西，儒家的事功与利己意识很浓，我们看了会有一种痛感。这些，侯德云都有记载。

辽南曾是日俄的殖民地，战火不断，加之“文革”中人为的破坏，蛮荒感与美丽的山水呈现着一种反差，要找一点往昔棋桌上的雅趣和贾平凹小说的易学之气，是大难之事。侯德云笔下的乡下与小镇，古文明的背景模糊。一种是乡下人的实用哲学，一种乃官本位文化的子遗，它们混在一个空间，只有空寂里的无聊仍在。侯德云在《酒鬼的爱情》里，写到现实的力量大于浪漫的生活，有一种悲哀的感叹。《老家拍案惊奇》对姜顿生活里的乡民哲学有着彻骨的体味。人在无路可走中的悲剧选择，衬托出环境的凄凉。人性的美丽之色完全在灰暗中消失了。《婚姻大事》里的人生起伏、俗语的暗示、精神的灵光与此类实用主义的生活是无缘的。作者除了写这些世相外，还描绘了官本位文化对基层人的异化。《开会》所呈现的父亲生活，没有多少乐趣，退休后惟有模拟开会的样子才心安理得。这种已经被社会惯性扭曲的人，精神与土地山林已经没有关系，空无者的生活依傍在虚幻的影子里。

世相小说乃生活原态的描摹，拒绝浪漫与空想。旧时的世相小说有乡间秘史，江湖野气之类。侯德云注意到了这个传统，关注普通人的非正常生活，那里有对生命的思考，特别是对畸形人生的扫描。《假如》写无常之爱，《酒后》点破寻常里的隐秘，《小偷的忠告》乃黑道哲学，《道具》乃中国人“面子”的写真，《谁家丢了一只鸡》让人

近年来，津子围、侯德云、陈昌平、张鲁镭、刘东、于立极、紫金7位大连作家创作活跃，他们的题材体裁各异，门类丰富多彩，体现了大连文学开放性、多元性的品格，其作品描绘出的地域风情、艺术特色和独异的“海蛎子”语言，构成了一幅鲜活的大连文学地图，这个被称之为“海蛎子组合”的“60后”创作群体值得关注。

氛围良好的文学社区

□贺绍俊

地产商人做换肾手术的故事，这个房地产商人的道貌岸然和肆无忌惮，折射出了国民性是如何腐蚀到当代社会的各个层面的，从这里可以看到陈昌平是在对鲁迅作出一种历史回应。侯昌平具有一种鲜明的人民立场。他有一篇小说叫《首席人民》，他也许是在努力做一个小说中的“首席人民”，当他的单簧管出现人民的旋律时，便会从低音区滑向高音区，变得嘹亮而明朗。

侯德云是写小小说的，小小说是篇幅极其短小的文体，有的作家也许会对它敷衍了事，但是侯德云却将小说当成精益求精的艺术对待，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他精益求精的结晶。因此我愿意把他比喻为一把竖琴，竖琴是乐队中最具色彩性的乐器，音质优美，主要担任和声伴奏，但当他演奏乐段时，会给人一种画龙点睛的效果，令人难以忘怀。侯德云是当代小小说中的领军人物之一，我觉得侯德云写小小说处处表现出精益求精的态度，无论立意，还是炼字，都是匠心独具，从而形成了他的简洁、优美、富于哲理的写作风格。侯德云在小说领域的成功，也缘于他对小小说艺术具有系统性的理论认识，同时也将这种理论智慧通过随笔的方式表达出来。小小说界的著名评论家和编辑家杨晓敏评价侯德云是“一马当先，笑傲江湖”。我觉得这种评价足以看出侯德云在小小说界举足轻重的位置。

张鲁镭小说写作起步是比较晚的，但她一亮相就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因为她有一颗平常心，又对生活充满了热爱之心。她写的是日常生活，而她的日常叙事贴近普通人的生活情绪，宛如一把如歌如泣的二胡，倾诉着生活的甜蜜与忧伤，跳动着生命的节律。

想起前人对国民性的审视。侯德云描写这些人与事，无奈与悲哀都有，没有故弄玄虚，就那么以寻常笔法为之，而人间百态已出，辽南人五花八门的生活方式，有了立体的雕塑感。在故乡作家的小说里，我看到了被遮蔽的一隅，与诗性里的乡土大异。我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人常常逃避现实，躲到象牙塔里自娱，得到的多是不真实的幻相，与广大的关系就疏远了。逃避世相虽得片刻的逍遥，但也漏掉了人生的真实。深入江湖者才知道滋味和浓淡。观景的人以幻象为美，不知东西，误辨南北。而真相的体认者在寻常的笑意中，无意间就把士大夫式的梦话颠覆了。

孟繁华：

善于发现世间的伪善与欺诈

陈昌平是被严重忽略的一个作家。他写的东西并不是很多，但是每一篇都有很大的反响，具有很高的质量。

《汉奸》是我喜欢的一部作品。一个人怎么被命名为汉奸，是需要讨论的。他内心对日本人很反感，但是这个日本人对中国文化有景仰和学习的热情，他又觉得可以接受。我教你书法可以，但是每天派日本人押送我去，我是被迫的，我不得不去。交往久了则觉得这个日本人并没有那么十恶不赦，逐渐对自己的文化有一种优越感，但是面对侵略者的时候，立场和气节不能变。然而，他对自己人解释不了这一切，解放以后必然要被打成汉奸。一个人怎么沦为汉奸，陈昌平把这个过程讲述得非常简洁，小说确实写得非常好。小说《英雄》和《汉奸》有相似性，“英雄”老高是一个普通工人，退休之后喜欢演讲，愿意说话，在不断的演讲中逐渐找到了感觉，但是他总有失语的时候，总有讲不出来的时候，于是就开始篡改历史，然后就有人找他了。辽宁这个地方是有中国英雄文化的地方，英雄文化哺育的人都有英雄的幻觉和期待，特别是辽宁，从雷锋到郭明义，都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，在辽宁不能不受着英雄形象的深刻影响，但是老高这个英雄搞出事了，事实上，陈昌平一直在寻找生活中的荒诞性，他让我们看到了在中国当下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是怎么表达的。

《国家机密》非常典型，主人公小六子经常做梦，是现实生活中的先知和神童，于主任因为掌握了这个秘密，就盼着小六子做梦，以知道当下要发生什么。这个荒诞性的发现了不起，反映了小说家的敏锐性。对荒诞的发现和寻找是陈昌平整个小说创作中一直在坚持的，他的荒诞和西方的荒诞并不完全一样，不是在形式、修辞、结构上花心思，而是在现实生活中构成这样的关系，似是而非，你说是这样的生活未必，你说不是这样的生活也未必。

顾建平：

细致展现生活微澜

张鲁镭的新小说集命名为《美丽鞋匠铺》，感觉比第一个小说集《小日子》写得更加从容、更加得心应手，读起来也更加为愉悦。小日子基本是没有出息的日子、不张扬的日子，小人物生活里的小波折，对于我们的大时代就是小日子。宁静的小日子总是被意外给以致命的一击。比如重病中的丈夫想给老婆找新的丈夫等等，都是很有戏的，这样的故事没有大人物，没有大的波澜，都是日常的生活，但是小小的波澜在小人物的生活中变成了巨大的生活波涛。

于立极创作的是“少年心理咨询小说”。于立极以他在医科大学工作10年的经历，萌发了用小说的形式来对少年儿童进行心理咨询治疗的想法。以此理念创作的首篇少年心理咨询小说《自杀电话》发表后，就被全国青少年读者投票评为“最受孩子欢迎的作品”。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因为一次车祸失去双腿，当她从心理困扰中走出来后，对生命的意义有了切身的理解，从此便开办了一条心理咨询热线，与同龄人一起探讨完美、早恋、父母离异、自残等问题，甚至追问死亡。于立极以文学的方式真诚地为少年儿童作心理服务，体现出一种难得的人文关怀。

“海蛎子组合”并不是一个文学流派，虽然组合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不同的题材偏爱，叙述个性和文体选择，他们在审美追求上却有着共同的倾向，都倾向于优雅、古典的审美，而力避过于世俗化的“客观再现”和极端现代派的“恶之花”。从这一点来看，我认为称他们为“海蛎子组合”是非常贴近的，因为他们的每一部作品，对于读者来说，就像是在品尝海蛎子般的美味。我以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，地域文化的自然属性对作家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弱化，而地域的政治性、行政性和社会性对作家群体的影响却不应该被低估。一定行政地理区域内的作家协会对本区域形成某种归宿感，区域的机制特征和动态走势也会影响到作家的文学活动，因此我提出一个文学社区的概念。文学社区是指在一定的地域界限里，通过一些文学组织将该地区的作家凝聚在一起，相互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领域。大连“海蛎子组合”的形成，证明大连是有一个良好的文学社区的，这得益于当地文学领导部门对文学的重视，以及对作家的尊重。另外，大连的作家也能够相互理解，相互切磋，从而营造出人气很旺的文学场。“海蛎子组合”就给我们带来一个很有益的启发。一个地区的文学要有所发展，就应该营造出具有良好氛围的文学社区。

刘东创作的是“采访小说”。先后采访了90多位年轻人，倾听他们讲述高中学习阶段的生活。在此基础上，他选取了12篇主人公的故事写了12篇小说，这些小说既有写实性，又充分发挥了小说虚构性的特长，因此小说不仅好看，而且贴近现实，直面现实问题，由此结集的《轰然作响的记忆》，出版数年来一直受到读者欢迎。他的采访小说是现实感特别强烈的成长小说，采访的实践使得刘东置身于少年们的成长过程中，深入到少年们的内心中。

张鲁镭的小说生活场极其强大，使得那些苦思冥想的伪生活相对就没意思了。《美丽鞋匠铺》的题材面非常广，每一个题材作者都驾轻就熟。因为作家是行家里手，因为她曾经做过裁缝，曾经在街头给人擦过鞋，写到每一个题材都非常熟悉，她是一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作者，尤其对于美食，在小说中写到美食，不厌其烦描写美食的制作过程，记录下来可以成为一个菜谱。每一个步骤都是非常精细的，比如《全家福》里的一道菜就是“全家福”，大家可以做一下，八九不离十，可以做成一道菜。作家有敏锐的洞察力，体现了生活的智慧。再比如，好看和美有什么区别，也有她独到的解析。她的语言非常生活化，符合生活的语境，阅读上非常愉快。

这是我读张鲁镭小说的一个印象，张鲁镭的小说可以进入优秀短篇小说的行列，具有独创性，她是一个合格的讲故事的人，没有故事不成为小说。

艾克拜尔·米吉提：

在同质中寻求突破

紫金最早见诸媒体的文章是散文，之后写了几十篇散文随笔，然后开始写小说，之后又开始写长篇纪实和电视剧等等，2013年获得了第六届“中国作家·鄂尔多斯”文学奖。这说明她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，是一个对各种文学题材都能驾驭的作家。

紫金的作品很有特色。公安系统的作家不少，我们也一直关注，并推出了一些公安作家和公安题材的作品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往往会陷入一种行家的局限，视野打不开，总是围绕具体的案件、具体的事例在写作，很难有一些突破。在这一点上，紫金超出了这个局限，能够把作品放在社会的背景下来把握和写作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现在很多作家都已经职业化了，专写长篇小说或短篇小说，但是往往写了十几部长篇，却很难回过头来审阅。一个作家能够保持自己独特的视角写出作品，为社会作贡献，这是非常难得的。

公安部开展了一年多的清网行动，在这个背景下，紫金写出了电视剧《第四情报组》，写得非常好，特别是高科技手段在刑侦中的应用，过去说网恢恢疏而不漏，现在更厉害，任何一个细节在科技时代都可以把握，可以立即用倒推法导出来，让人耳目一新。

通过文学作品，会发现警察有一种亲切感，也有了更真切的认识，紫金的作品实现了这样的价值。她是一个值得我们期待的作家。

马 力：

观照少年儿童的生命力量

大连“60后”作家“海蛎子组合”里有两位儿童文学作家，可以看出大连对儿童文学的重视，儿童文学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儿童重要，早在“五四”时期，陈独秀就把儿童文学看成儿童文化，非常的关注。

于立极在辽宁是小虎队的重要成员，是非常有名的，在全国的儿童文学创作中也是一个备受关注、很有前途的作家。最近，我看过他的一个长篇小说《自杀电话》，这部小说的价值有两点：

第一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——儿童心理健康问题，涉及到对当代儿童如何评价。他提出的儿童心理问题，打破了19世纪认为“儿童是天使”这样一个基本评价，也不像20世纪80年代美国艾尔兹伯格教授说的“童年消失”。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，就是现代儿童确实存在心理问题，而且敢于写出来，能够写出来。另一方面，他还提出了救赎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已经摆在那里，出路在哪里？他对出路也做了设想，这个设想为我们解决当代儿童心理问题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思考。第二，他的小说文体是儿童心理咨询小说。他已经耕耘很久了，从短篇写起，就受到了国内很多评论家的关注，到写《自杀电话》的时候，展现的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两个少年，而是一个时代少年的心理问题和如何解决的问题，内涵非常厚重。

这个小说有一种意象上的东西，重要的意象就是自杀电话。有双重的内涵，一个内涵就是给我们一个警报，当代少年已经出现了心理问题，自杀电话就是一个最好的表现。其次，自杀电话还延伸出了热线，既然出现一个问题——通过电话反映出来的，最后也是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解决的，获得了双重的含义。说明当代少年并不是“垮掉的一代”，并没有“童年消失”，虽然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，但是内心深处有生命的力量，能够自救、能够疗伤，最后还能完善自己，健康地成长。